

杜学 与 苏学

杨胜宽

著

巴蜀书社

杜学与苏学

杨胜宽 著
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杜学与苏学/杨胜宽著. - 成都:巴蜀书社, 2003.6
ISBN 7-80659-488-4

I. 杜... II. 杨... III. ①杜诗-文学研究②苏轼
(1037~1101)-古典诗歌-文学研究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3761 号

责任编辑 谢艺波

封面设计 易 阳

《杜学与苏学》

杨胜宽 著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)

总编室电话(028)86656816

发行一科电话(028)86662019

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

印张 10.5

字数 234 千

2003 年 6 月第一版

200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3500 册

ISBN 7-80659-488-4/I·174

定价:2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

我的古典文学研究历程（代序）

杨胜宽

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，始于大学的第一堂古典文学课。任课老师是西南师大中文系谭优学先生。对于经过文革十年浩劫之后改革高考制度的第二届大学生，听着先生随口背出的先秦诸子、唐诗宋词，对知识的渴求之情油然而生，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大精深充满好奇。

在大学四年学习中，一个个“长明”教室的鏖战之夜，我基本上都浸泡在古典文学的知识海洋里，越学，越觉得这个海洋的浩瀚。到三年级，遂萌生了考研的想法，专业自然是古典文学，方向则定在唐宋段。

学习中，除了大量抄写名家名作之外，偶有所思所感，或批于书旁，或记于笔记，便有了写论文的冲动。第一次写论文，是关于对谢灵运《登江中孤屿》中“乱流趋正绝”一句的理解，题目叫《“乱流趋正绝”辨》，当时心高气傲，写成后直接投寄最权

威的专业刊物《文学遗产》，结果不言而喻。但编辑亲自给我写了回信，谈如何学习和思考。这次失败倒成为我学术研究的重要开端。随后，又决定从唐诗的三流作家入手，搞一个作家的全面研究，选的是中唐乐府诗人王建。从他的生卒年代、仕途经历、文学交往到作品思想、艺术地位，写成洋洋洒洒长达五万字的论文，几经修改，送请此时正上我们《杜诗选读》课的曹慕樊先生审阅。先生很仔细地通看了全文，不仅作了旁批，改正了不当的字词，还写了评价意见，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指出“文章枝蔓”。不用说，这篇“大”作又成了早死的胎儿。但这次失败，教给了我论文写作的方法技巧。

考上陕西师大中文系赵怀德先生的研究生以后，先生的指导思路是重视知识基础，锤炼基本功，不主张过早写作和发表文章。他经常以刘师培、黄侃等人不轻言著述的例子来教导我，而对我阅读古代文史哲典籍却抓得很紧，要求严格。我每周把读书笔记送给先生看，每次都是全批全改，并指出我的不足。这期间，我花了很多时间读《诗经》，风雅部分几乎每篇都写了读书笔记，共有16开100页硬壳笔记本一满本。现在看来，其中不少批驳前人的观点都难以成立，但它锻炼了我在看书学习中思考问题、提出问题的能力，我以为，这是做学问最重要的基本功。

1985年，我研究生毕业回到西南师大中文系，没有按所学的古籍整理专业到古籍出版单位工作，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想当大学教师，走一边传授知识一边搞学术研究的路子，教唐宋文学。由于新教师重要的是在讲台上立住脚，加之在备课、讲课和与学生的交流中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因此，在最初的几年中，总是根据教学的需要来进行研究。1986年调到乐山师专以后，

情况一直是这样。

我治学路子的转变，得追溯到回西南师大工作时。在读研离开西师的三年中，我一直保持着与曹先生的通信，放假回川，也常去拜望，于先生处，获得立身治学的教益甚多。一次，先生给我谈治学之道，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体会，特别强调治学须从“大家”入手，道理在于：只有吃透“大家”，才能了解古典文学的代表与精华；只有领略了“大家”的世界，才能具备高屋建瓴的眼光，一览众山小，拿准对其他作家评价的尺度与分寸。先生明确要求我，于唐代研究杜甫，于宋代研究苏轼。这两人是两个时代最有代表性、成就最高的作家。闻先生言，虽力不能行，但心向往之。

把我引向探询“大家”世界之路的，是发生于1990年的两件偶然之事。那年暑假，学校根据当时的省教委文件要求，要我申报一项省级青年科研基金课题，时间很紧，一时不知报什么好。想到在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工作，为了体现地方特色，就报了个《苏轼人格研究》的题目，对能否成功也没抱什么希望，主要是为了应差。结果，项目被批准了。这一下，着实让我慌了神。觉得这个题目作出来太难了，自己缺乏必要的学术准备。但项目是任务，不完成是不行的。这就正式开始了我研究苏轼的艰难历程。

另一件事，是这年10月到江油去参加由四川师大主办的全国赋学研讨会。到达当晚，认识了《杜甫研究学刊》的编辑曾亚兰女士。摆谈间，她了解到我与西南民族学院田耕字兄都是搞唐宋文学的，便邀我们为学刊写稿，并表达了四川杜甫研究学会希望我们这样的年青人参加的意思。此后不久，我写了《从苏黄论

杜看宋诗风格的变化》一文，寄给学刊，登在该刊 1992 年第 4 期上。这便是我研究杜甫的开始。

可以说，1990 年，是我从事杜、苏两位大家研究的新起点。

此后十余年间，我一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两位大家身上。选择这样的治学路子，取决于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。客观原因是，自己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，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行政事务中，搞学术研究只能在节假日及上班之余进行，时间总量大大减少，且更加零散，研究的精力、心思也大受影响。于是，只得把研究的战线大大收缩，改面为点。显然，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调整。

从主观方面看，对“大家”的研究入门较难，难度不在于其作品的多少，而在于历代的研究资料很丰富，不尽可能地占有并熟悉这些资料，你对作家就无法置喙。因此，要了解“大家”的世界，先得了解前人研究“大家”的世界，那是一个浩瀚的世界。其次，“大家”之为“大家”，正在于其耐人研究的无穷魅力。其多方面的、高水平的成就固然是耐人研究的重要因素，而其成长、心理、思想、品质、作品、艺术、影响等众多领域，更有常说常新的丰富内涵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我对杜、苏的研究，时间越长，体会越深。

以苏轼为例，他是古代作家中最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物之一。林语堂从 19 个方面描述他的多样化才能与成就，最后不得不承认：“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。”（《苏东坡传·序》）苏轼在人文科学领域，诗、词、文、书法、绘画、茶艺、酒艺、收藏、品鉴、政治、哲学、宗教、养生、行政管理、军事管理、社会救济等方面，都曾涉猎，有所建树，有些领域，达到

了宋代的最高水平，成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。他还在不少自然科学领域有所作为，如机械制造、酿酒、工程建设、医药、治污等方面。这样一位全能的人物，研究者要把他所涉猎的每一个方面了解清楚，已经不易，更何况，了解每一个方面，必然涉及其发展历史和当时的进展及应用情况，会牵涉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。因此，要全面研究苏轼，就必须面对苏轼所涉猎的世界，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。这样一个广泛的世界，没有多年的工夫，那是难以真正了解的。同样，花费很大工夫了解了一位大家的广博世界，你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

我研究苏轼十几年，出版了《苏轼人格研究》和《苏轼与苏门人士文学概观》两书，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，概括起来，只是涉及苏轼其人其成就的很少方面，如文艺学、哲学、政治、美学、身世遭遇、文人交往等，且是浅尝辄止，觉得不把当时的社会情况作全面了解，就无法说清任何一个问题。具体到某个方面，情况也很复杂。比如苏轼与文人们的交往，不仅涉及到苏轼一生文学事业和文学追求的问题，还涉及到当时的政治斗争、思想潮流、社会风气、士林趋尚、文化背景，以及宋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形势与规律等，对这些没有一定的了解，也是不能深刻认识苏门文人集团的形成及其作用的。本书选录的苏轼研究部分论文，是独立于以上两书之外的单篇作品，有的是在写作两书的过程中，解决相关问题的副产品，有的是两书出版之后陆续耕耘的新作，合起来看，也许能够反映我这些年在苏轼这样的大家的世界里，所拾得的一鳞半爪。

杜甫之“大”，则在于其诗歌集古今之大成及对后世诗人的广泛沾溉与影响，唐末人就誉杜诗为“诗史”，后人称杜甫为

“诗圣”，在古今诗人中，其地位是独一无二的。如果说苏轼之“大”是广博，那杜甫之“大”就是高深，不可攀，不可及，不可逾越。《诗三百》虽称为“经”，其对春秋以后的影响，恐怕根本比不上杜诗对唐代以后影响的巨大，这足以见出杜甫作为古典诗歌大家的无穷魅力。因此，我的杜诗研究，主要集中在杜学史方面，特别是宋代杜学史的研究，本书选录的，多数属于这个课题的成果。虽然迄今还是搞的个案研究，但我曾经定下的最终形成“宋代杜学史”乃至“中国杜学史”的目标，将按照我的理解和我的研究计划，逐步达到。倘若这个目标得以实现，也许我们会看到在杜诗哺育之下，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精彩的世界。

回顾二十多年学习、研究古典文学的经历，我的体会是：

第一，学术研究，有时某些机缘也是很重要的。比如我自己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的变化，就是某些重要机缘的结果。老师的指点自不待言，如果不是工作环境的改变，恐怕也难言我与苏轼、郭沫若的不解之缘；不是课题任务的压力，和那些热心提携者的帮助，我的学术发展的道路可能完全不同。最近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让我为刊物创刊10周年写点感想，我写了《裹挟的力量——我与杜甫研究学刊十年》（《杜甫研究学刊》，2001.1）一文，中心意思是说，学刊同仁和学界师友，10年来一直裹挟着我前进，才使我始终没有放弃杜甫研究，不能放弃，不应放弃，不敢放弃，感情很复杂。为此，我要感谢那些多年来给我指点、关心和帮助的人们。

第二，作为大学教师，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高是同等重要的，两者可以互相促进，它们之间不矛盾，更不对立。教学与科研，就像人的两腿，用好两条腿，才能走好大学教师之路。也

许存在个人的相对差异，也许一开始无法很好兼顾，但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，必须具备这两方面的素质能力，并且尽量发挥两者互相促进、相得益彰的作用。科研是提高教学水平的治本之策，这是我的深切体会。

第三，学术的“专”与“通”是相对的，没有绝对的标准与界线，应该追求宏通基础上的专精，专诣基础上的通达。传统的学术标准提倡专精，鼓励做专家，没有专门造诣的被诟称为“杂”，颇受轻视。今天的学术发展趋势越来越重视融会贯通，宏观综合，似乎专精不那么合时宜了。但是，只要我们不是对立地看问题，两者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的。个人治学，受种种条件制约，样样精通是不可能的，只能在某些领域或方面作些系统、深入的钻研。同时，“专”并不意味着不对问题进行宏观的考察审视，“专”也不是小而深、细而窄，很多专业问题，需要跨学科、跨时空地研究思考，才能得到解决。

第四，学术不仅是一种事业，也是生命的组成部分；做学问不只是追求一种成就，也是追求一种生命价值。古今第一流的作家，其成功的关键不只是才能，还有其高尚的志向和卓越的品格。做学问的道理也如此。研究第一流的古代作家，面对他们所开拓的广阔世界，不应只看到他们的才能与成就，而应该学习他们的志向与品格，应用到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生命体验中去。要说我在治学历程中有什么收获，我想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苏东坡提倡“道”“技”两进，其用意也在于此吧。

2002年3月

目 录

我的古典文学研究历程（代序）	（ 1 ）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·杜学研究·

杜甫的文学事业与文学理想	（ 3 ）
“拙”杜论	（ 27 ）
从《河岳英灵集》不选杜诗说到殷璠的选诗标准	（ 41 ）
唐宋人所体认的杜甫精神	（ 52 ）
宋代蜀人论杜	（ 72 ）
南宋杜学片论	（ 86 ）
从苏黄论杜看宋诗风格的变化	（ 103 ）
张戒论诗：尚意与崇杜	（ 117 ）
葛立方论学杜	（ 133 ）
陈善论杜：重韵与重格	（ 148 ）

· 苏学研究 ·

苏轼利民思想刍议·····	(169)
欧苏相合于“道”·····	(188)
苏轼的“闲适之乐”·····	(203)
苏轼躬耕的苦与乐·····	(220)
自是先生游物外，非关此地独超然·····	(236)
笔势仿佛《离骚》经·····	(252)
论“以故为新，以俗为雅”·····	(268)
试论苏轼与秦观用情的不同方式·····	(283)
少游“词心”，深契东坡·····	(296)
东坡与放翁：隔代两知音·····	(312)

杜
学
研
究

杜甫的文学事业与文学理想

诗人杜甫生当唐之盛时，耳闻目睹过开元全盛之世，伴随着盛世之梦而与生俱长的，是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。保留下来的最早一首杜诗《望岳》，末二句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已隐然显出当年孔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雄心壮志^①。那正是开元末年满怀壮心的年轻杜甫的心迹表露。但当历史跨入天宝时代，随着权奸当道，外戚弄权，时局的恶变令热心求寻功名之路的杜甫难以逆料，涉世未深的诗人茫然不知所从。反映在他天宝年间的诗作中，既不乏屡屡慨叹遭遇淹蹇的牢骚之词，有时又慌不择路地投谒一些口碑不佳的政客军阀，希求引荐，这似乎反映了诗人杜甫急于求成和对政治缺乏深刻认识的幼稚心态。浦起龙说杜甫“天宝间诗，大抵喜功名，愤遇蹇，忧乱萌三项居多”^②，应是符合实情的。其后杜甫浅涉宦海，几乎是铩羽而逃，加之安史之乱起，迫使他四处流寓，人生的历练和严酷的现实，逐渐使杜甫明白了他能为时代做些什么，自己的人生价值、理想之梦被金戈铁马击碎之后，将以适合于现实与自身实际的方式去实现，这就是以诗人的良心、诗人的情怀、诗人的笔触去记录一

代时事，去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。结果是，在政治上鲜有作为和影响的杜甫，成为光照千古的集大成诗人。应该说，杜甫在文学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，有着时局背景的挤兑与捉弄，但更主要和内在的，在于杜甫本质上是一个文人，他的心态、价值观和一生追求，具有文化人的基本特征。

一、杜甫的文化心态与文学事业

无论从杜甫的一生履历还是所取得的成就看，都不难得出他是一位道地的诗人的结论。但令人费解的一面是，诗人一生，特别是长安客居时期，苦苦寻求着从政的一切机会，有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，到了请求引荐的地步，在他的诗中，不时热切地表达着诗人的政治理想与忧济苍生的愿望。倘若读者过于看重这一面，就很容易得出完全是时代吝惜一次让热血诗人一展施政宏图的机会，是无情的现实掩埋了诗人的政治才华和政治理想。固然，时势的无情是扼杀杜甫政治生命的重要因素，但如果历史可以假设，让杜甫与诗人李白同年或稍长，有在开元末和天宝初慨然从政的机会，恐怕结局也不会比李白更好：他虽然不像李白那样因狂傲不羁为封建政治环境所不容，他的拙直性格和对文学的痴恋情结，也不会使他成为政治家，甚至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作为。这道理就在于：他和李白一样，其秉性和兴趣只适合做诗人，而不适合搞政治。自然，封建时代的人生出路是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无法斩断文人与政客联系的脐带，但同样清楚的事实是，那怕是一起考中进士的同年，后来有的进而成为以政治生涯为主

的政客，有的则在仕途的“主业”上收获不大，而在为文为诗的“副业”上成就斐然，奠定了在历史上的一席之地。当然，各代也不乏主副业并举的士大夫，如王安石之类，但至少杜甫缺乏这样的才具和机遇。

考察杜甫作为文化人的基本心态，不仅要看他一生做过些什么，还要看他一生在想些什么。因为封建时代的士人在种种复杂因素影响之下，有着较为普遍的人格分裂的矛盾现象，有时实际做的与其心里真正想做的，并不一致，反之亦然。因此，有时一个人所想的，比他正在做的更能真实反映其心态和愿望，更能体现其真实形象。

（一）杜甫的事业观

一个人对一生所从事或将要从事的事业的看法，往往体现着他对于某一职业的喜爱和成就期待。就杜甫而言，他自幼接受儒家思想和知识教育，且一直处于其祖父——诗人杜审言的“祖传家业”的熏陶和诱导之下，他对诗人这一职业，从一开始就有着自觉的认同，并且把光大祖业视为一生的主要使命。天宝年间所作的《进雕赋表》，很清楚地表达了诗人的“角色定位”：

臣之近代陵夷，公侯之贵磨灭，鼎铭之勋，不复照耀于明时。自先君恕、预以降，奉儒守官，未坠素业矣。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，修文于中宗之朝，高视于藏书之府。故天下学士，到于今而师之。臣幸赖先臣绪业，自七岁所缀诗笔，向四十载矣，约千有余篇。今贾马之徒，得排金门、上玉堂者，甚众矣。惟臣衣不盖体，尝寄食于人。……明主倘使执先祖之故事，拔泥途之久辱，则臣之述作，虽不能鼓吹六经，先鸣数子，至于沉郁顿挫，随时敏捷，扬雄、